

目 次

前 言……………文 岩(1)

钟肇政

天亮前夜……………(25)

大崙嶼的呜咽……………(34)

中元的构图……………(53)

白翎鹭之歌……………(72)

林海音

金鲤鱼的百衲裙……………(95)

蓝色画像……………(108)

朱西宁

狼……………(133)

破晓时分……………(170)

司马中原

红丝凤……………(213)

柏 杨

火车上……………(248)

聂华苓

爱国奖券……………(263)

珊珊，你在哪儿？……………(281)

王大年的几件喜事……………(297)

永不闭幕的舞台……………(324)

孟 瑶

白 日……………(352)

潘人木

哀乐小天地……………(365)

闹蛇之夜……………(378)

端木方

摸 梦……………(390)

刘非烈

喇叭手……………(418)

王鼎钧

土……………(425)

孤 侠……………(442)

郭良窠

周末何处去……………(460)

小夫妻的娱乐节目……………(469)

萧 白

散 戏……………(482)

杨海宴

矮檐下……………(489)

王默人

留不住的脚步……………(502)

桑品载

微弱的光……………(510)

子 于

磁 瓶……………(521)

高处总是眼亮……………(538)

蒸 笼……………(564)

郑 焕

异 客……………(585)

林钟隆

迷 雾……………(598)

廖清秀

阿九与土地公……………(610)

金钱的故事……………(619)

文 心

祖父的故事……………(630)

郑清文

门……………(643)

槟榔城……………(657)

江 上

矿坑里……………(674)

有一个死……………(683)

李 乔	
桃花眼·····	(700)
那棵鹿仔树·····	(720)
黄 娟	
哑 婚·····	(741)
奔 汤	
生存的条件·····	(755)
季 季	
拾玉镯·····	(764)
黄灵芝	
蟹·····	(788)

前 言

文 岩

一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有的取道香港转赴解放区，有的等待解放；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与解放区的作家在北平胜利会师，举行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撤退时，几乎没有几个作家跟着他们逃到台湾去。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大陆来台的作家之中，已经成名且号召有力的，简直寥落可数”^①。在这“寥落可数”的人当中，胡适是在大陆解放前夕将家属安置在台湾，然后奉蒋介石之命，去了美国，一九五八年才又从美国回到台湾的；谢冰莹和梁实秋，是分别于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去的；台静农和黎烈文则都是抗战胜利后，分别于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去台湾教书，大陆解放后被阻在台湾的；苏雪林（绿漪）则于一九五二年从法国去的台湾。

^① 余光中，《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

这“寥落可数”的几个人在去台湾之前，实际上都已不从事文学创作，到台湾之后也大都转入各院校任教，基本上都不怎么写小说了。

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一些不知名的所谓文化人，到了台湾之后逐渐地“有了杂志，有了报纸的副刊，便开始动起笔来了。可是从他们笔尖中流出来的多半是什么蓝色的忧郁，以及……‘大腿、樱唇、隆胸、丰臀的色情文艺和胡扯白道的洋幽默’，文艺园地里只是一片秋日的荒芜，是混乱与堕落，也就是所谓的灰色与黄色，全是蝴蝶鸳鸯派的玩意儿，……那时节张资平的后裔们打着艺术至上的小旗子在文学范围里卿卿我我，哭哭啼啼。”^①不久，台湾当局提出了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梦呓般的口号。为此，台湾当局御用的几个文艺团体——“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相继成立之后，都公开号召、提倡和鼓励“反共的战斗文艺”。于是，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又为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的反共文学和逃避文学所垄断，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实不多见。

在那些乌七八糟的反共文学中，被吹捧得最凶的有几个人：一是反共作家王蓝（河北省阜城人，一九二二年生），他有一本反共小说《蓝与黑》；一是姜贵（本名王林渡，原籍山东诸城，一九〇三年生人），此人在大陆时虽然也出版过三部

① 何欣：《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

作品，本是个不见经传的角色，到台湾后，于一九五二年写了一部反共小说《旋风》，经胡适大力推荐才得以出版，一下子成了台湾最著名的反共作家。后来他又写了《春城》、《碧海青天夜夜心》、《白马篇》、《铜柏山》、《重阳》等反共小说；另一个陈纪滢（河北省安国县人，一九〇八年生）写了本《获村传》，通过河北省保定南部的一个农村——获村四十多年的变化，胡说什么共产党来了之后；“白天，获村是兽世界；晚上，获村是鬼天下”，甚至一个参加过义和团的老贫农傻常顺儿也被活埋了，云云。但是，这类反共小说，除了台湾当局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大肆吹捧之外，广大读者并不欢迎，甚至不屑一读。正如一位旅美的台湾评论家后来所说：“尽管好评如云，姜贵先生的小说在台湾始终是个冷门，这对‘反共精神堡垒’，的台湾真是一个嘲刺。”^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台湾长期处于和祖国大陆隔绝的不正常状态，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人无时不在怀念祖国大陆的骨肉同胞；因之，三十年来的台湾文学中，“乡愁”几乎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真正受到读者欢迎的，是这个乡愁文学。正如一位台湾评论家指出的，“由于对家乡和往事固执的怀念”，台湾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就题材而论，……有将近一半是具象化的乡愁”，于是，在台湾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乡愁文学。^② 那些乡愁文学的作者们，“所叙述的多是过去的经验，‘带有浓浓的乡愁’。他们身居台湾，但时时

① 刘绍铭：《十年来台湾小说》。

② 齐邦媛：《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

有身在异乡为异客之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心理上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要在过去的日子里去寻找失去的一切，做为一种感情上的安慰，因此浓浓的乡愁是难免的了。叙述过去的生活面是很广泛的，从官场、战场直到姑奶奶的厨房绣房，这时的文学创作，乍一看，真是灿烂多姿。松柏杂草，任其并肩共生，出版过一本书，便成为作家了，他便有权利畅所欲言。”^①

同是乡愁文学，路子也不相同。开始，这种乡愁文学是和反共文学混杂在一起的。因为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之后，“即提出响当当的‘反攻复国’口号，从火车站到酒瓶标纸随处可见，可谓无所不在。这官方的神话正好代表了流放者的心态：从大陆逃来的人不过以台湾为临时基地，好发他们的美梦，希望有一天回到海峡的彼岸。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初期，这种神话在人民的政治心理上根深蒂固，没有人敢怀疑；当时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反映在这方面，不免产生麻醉作用。……（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眼光与胆量，来细看清楚错综复杂的形势，所以只好盲目接受（国民党）政府所宣传的反攻神话，他们更无勇气承认这种流放是永久的。结果这些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与现实脱节，布局情节老套公式化，故事的主人公不管如何饱尝流放的痛苦，总是会重临故土，与大陆上的家人团圆结局。这些作品满注思乡情怀，但这种悲伤的感受老是陈腐俗套，了无新意。”^②一九四九年以后，最早活跃于台湾文坛的是一些所谓“军中作家”（“也称为大兵文

① 何欣，《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

② 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

学”),如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等,还有郭衣洞(柏杨),他们都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国民党的中下层军政人员,他们也怀念他们远在大陆的家乡。如司马中原在《刀兵冢》的后记中说:“在古老的中国,落叶归根的叹息该不是低沉无力的,属于暮年的调子,而是一种强韧的观念——离乱中流落异地的祖先,如果不能回归故里,他们的子孙也会尽力完成他们的心愿。”上面举的那位评论家说:“在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等有力的笔下,……这份真诚的感动融化、凝固,成为具象化的乡愁,是台湾二十五年来文学创作的特色之一。”^①不过,朱西宁、司马中原等人笔下的“具象化的乡愁”,如本选集所选收的《狼》、《破晓时分》、《红丝凤》等,其最大的特色,是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那些古老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抽象的年代和抽象的大陆,只是让读者在那些远离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古老传奇和“乡野传闻”(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生在大陆的传奇和传闻)里借以寄托乡愁,这实际上是逃避文学的变种——逃避的乡愁文学。当然,这也是由于他们年纪很小就离开了大陆家乡,只是凭着模模糊糊的记忆去写大陆,难怪他们笔下的大陆总是那么虚无缥缈和抽象而又抽象了。正如一位台湾评论家所指出的:“朱西宁的创作的想象,也和司马中原一样,扎根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少小离家’的他对于故乡农村生活只凭着记忆了,记忆往往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会欺骗人的,朱西宁(别的作家也是这样的),只能

① 齐邦媛,《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

‘以少数实际经验加上大量想像经验来写’……”。①

二

台湾文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台湾文坛为反共文学和逃避文学所垄断的现象很是不满。一九五六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提倡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提出：

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我们虽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

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

我们认为：宣传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章，文学不可尽是宣传，文学有他千古不灭的价值在。

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这“文学不可尽是宣传”，标榜的是“反对宣传，不肯沦为宣传”，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反共文学的曲笔；他们也不赞成逃避文学，提倡“说老实话”和“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文学，这都是很难得

① 何欣：《三十年来台湾的小说》。

的。但是，在台湾要真正写出“说老实话”的作品并非易事。《文学杂志》虽标榜了“不想逃避现实”，它所刊载的作品远非篇篇如是，而且他们的现实也或多或少只限于他们那个小天地中的现实罢了；同时，有的作家尽管有时写过“说老实话”的作品，也不见得篇篇都“说老实话”。如潘人木，她既写过本选集所选的《哀乐小天地》、《闹蛇之夜》这样说了某种程度的老实话的短篇小说，但她也还写过内容不好的中篇小说《如梦记》和长篇小说《莲漪表妹》。不管怎样，《文学杂志》在彼时彼地那样登高一呼，其影响颇佳亦颇大。从此，小说的主流便从“军中作家”逐渐转移到“学院派”作家的手中。当时，在为数不多的敢于“说老实话”的作家当中，比较突出的是聂华苓；她也可以说是五十年代崛起的台湾“学院派”作家的代表之一。一位旅美的台湾评论家说她“是个相当安份而相当成功的小说家”^①；更主要的，她也是个严肃的小说家，她主张“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②她的小说正是这样。她不是借着古老的传说或“乡野传闻”来表达她的乡愁，而是直接表现了那些流落到台湾的大陆人的苦闷、迷惘、彷徨和精神空虚。她把自己这方面题材的小说选出十篇，以《台湾轶事》为题在北京出版。她在该书的《写在前面》中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

① 叶维廉，《突入一瞬的蜕变里——侧论聂华苓》。

② 聂华苓，《苓子是我吗？》。

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一部有份量的长篇小说，“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①如果说她的那些短篇小说，写的是那些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写他们失掉根的苦闷和患思乡病的痛苦；那么，《桑青与桃红》写的则是一个中国人流放他乡而精神分裂的悲剧，是一曲浪子的悲歌。小说的前两部，分别通过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和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以现代中国历史的这两个转折点为背景，来写桑青个人的故事。第二部以桑青在北平的日记的形式，反映了祖国大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日记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正是北平解放前后。这里穿插着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彻底溃败的一些重大事件。考虑到作者的处境，她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楔子和每部前面给移民局的信，则说明她后来又从台湾去了美国，并改名为“桃红”。她在这后两部的经历和通过她的经历所展现的生活，对祖国大陆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在聂华苓的一些短篇小说（包括本选集所选收的几篇）中，会看到从大陆到台湾去的男男女女的种种哀愁和不满；《桑青与桃红》的第三部《台北一阁楼》，则使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他们到台湾后的境遇。通过台北“阁

① 白先勇语，见《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

楼物人”的遭遇，象征了台湾省今日的处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阁楼，摇摇欲坠，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顿，这一切正象征着台湾岛的惶惶不安和暗寂孤独，以及暂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种种不正常状态。作者的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但在写实的基础上，人物、结构、背景和故事情节，都有寓意和影射，有时甚至变成卡夫卡式的梦魇，把我们带进一个远离现实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很现实的梦幻般的世界。

本辑所选孟瑶、潘人木、端木方、王默人、刘非烈、王鼎钧、杨海宴、桑品载、子于、萧白……等，也都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从大陆到台湾之后登上台湾文坛的作家。本辑所收的他们的作品，有的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大多为他们所熟悉的下层公教人员）的各式各样的遭遇；他们到台湾后“同生活做着日以继夜地挣扎，有的获得应付生活的哲学，产生了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有的深陷于贫困中而变得失掉了忍耐心，使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紊乱；有的凭着一种直觉的重返家园的信念而勇敢地应付一切挑战，能活于希望，死于希望；有的在生活洪流里浮沉，无数打击使他们变成被动的逆来顺受者、被动者，连对往昔的依恋之情也疏远了……”^① 还有些作品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生活。

^① 何欣：《从大学生到草地人》。

三

五十年代登上台湾文坛的林海音和钟理和，虽然也是抗战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大陆迁到台湾的，但他们都是台湾省人。

林海音的文学活动是到台湾之后开始的，但她的文学创作的准备时期则是在北京，她是在北京受的文学教育，童年和青年也都在北京度过，并曾在北京当过新闻记者，所以她的创作也大都取材于北京。她虽然在解放战争后期回到了故乡——台湾，但也满怀“乡愁”；这“乡愁”并非由她的故乡台湾引起，而是针对北京而发。这乡思是如此浓烈扰人，她不得不隔着台湾海峡倾吐对北京的怀念；这乡思驱使她写下了许多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难怪台湾有人说，林海音好象是个北京化的台湾作家，又似乎是台湾化的北京作家。这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她所写的《惠安馆传奇》，是一组以她在北京的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这组小说互相连贯，结集为《城南旧事》。她说：“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写的虽然也是过去的大陆，但却和当时风靡台湾的逃避文学不同。这些发生在北京城南的“旧事”，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旧中国的现实。她虽然只是

描写了一个小女孩——英子的观察和遭遇，却能以小见大，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头等大事。在《兰姨娘》中，英子站在大门口等看“出红差”时，作者写道：“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学生。……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那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台湾学生德先叔，英子的爸爸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闹革命的学生”，实际上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惠安馆传奇》通过惠安会馆那个“疯女人”和妞儿的不幸，反映了当时北京城的市民生活；《驴打滚儿》则通过从顺义进城当奶妈的宋妈，从侧面描写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在林海音的小说中，从清末民初的北京到现在的台湾，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的婚姻生活都是不幸的。如《城南旧事》中的秀贞（疯女人）、英子的母亲、兰姨娘、宋妈，还有《金鲤鱼的百衲裙》中的金鲤鱼，以及《蓝色画像》中的丽清，她们的爱情和婚姻都不顺心，尽管她们生活处境不同，但都不快乐。林海音从家庭这一狭窄的天地里，观察和洞悉了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苦难。她的探索，虽然有时也使他触及到了家庭以外的世界，但那是无意触及的，这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也只是陪衬，她真正有兴趣的，还是那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文学题材——妇女的命运。做为女作家的林海音，正是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的眼光，透过妇女的遭遇来观察世界和描写世界的。本选集所选收的她的几篇作品，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四

一九五一年登上文坛的钟肇政，是抗战胜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位有代表性的台湾省籍作家。他和他那一代的台湾青年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受的是日文奴化教育，看书、交谈、思考、动笔，脑子里装的都是日语词汇。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他已经二十岁了。他以坚强的毅力，从二十岁才开始学习祖国的汉语，并开始涉猎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通过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他慢慢有了写作欲望。开头，他以日文拟草稿，然后译成汉文，用这种方式写下最早的几篇作品；后来，逐渐习惯先以日文思考，再用汉文写作；最后才直接用汉文构思，直接用汉文写作。

钟肇政所关心的是台湾本省本土的人民和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悲痛的历史。他的取材局限在台湾乡土，故事背景大多是台湾省较偏僻的客家人的农村生活；他的作品中有时也出现知识分子，但他所写的知识分子往往也和农民有着血缘关系，因而也显出农民的影子。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如赖和、杨逵、吴浊流）所处的历史时期毕竟不同，他开始写作时，被外国占据的历史时期已告结束，他写日本占据时期的生活，是回过头来观察、思考和描写那段悲痛的历史的。

《浊流三部曲》为我们再现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前后的历史。这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主人公陆志龙是在日本占据

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第一部《浊流》，以作者在大溪当小学教师的经历为背景，写的是一九四四年春天，日本败象初露，但整个台湾犹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假象所蔽，台湾青年处在随时有可能被征去充当炮灰的苦闷时期。第二部《江山万里》，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半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战争的最后关头，正在做垂死挣扎。台湾同胞生活在猛烈的空袭、物资匮乏和盟军随时可能登陆的重重威胁之下。主人公陆成龙则被征入伍，当了一名“日本兵”，在日本军营受到法西斯残暴虐待，几乎致残。本选集收的《天亮前后》，也是这同一题材的短篇小说。第三部《流云》，写的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初期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台湾青年，陆志龙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祖国文化，以坚定不移的意志想当一个作家——这正是钟肇政自己的经历。

台湾同胞具有英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身为台湾省的中国作家的钟肇政，从他开始写作，就想以八十年来台湾历史为背景，写一部“史诗式”的《台湾人三部曲》。这部巨著以九座寮的陆氏家族为中心，表现了台湾同胞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奋力图存，为生存而斗争，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

《沉沦》是《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的开头是距故事发生之前的一百年，陆荣邦从祖籍——广东省长乐县只身渡海来到台湾，先在台北府淡水县给一个地主当长工。他为人老实，也没有什么雄心，只想能挣得一些银子寄回祖籍，对父母尽一点孝道便心满意足了。后来，他用辛勤